

黎简手批《昌黎先生诗集注》*

周 兴 陆

韩愈《昌黎先生诗集》的注释、评论,是清人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笺注本以顾嗣立的《昌黎诗集注》和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最为著名。评点本,过去学者提及的有朱彝尊、汪琬、何焯、严虞惇、蒋抱玄等诸家^①。还有一些评点韩愈诗歌的重要文献,为研究韩诗和整理韩诗资料的学者所未知,黎简手批《昌黎先生诗集注》,就是其中之一。

黎简(1748—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又号百花村夫子,广东顺德人,书画家,诗人,有《五百四峰堂诗钞》,诗风幽峭劲拔,在清代中后期宋诗派崛起的高潮中,颇受好评。翁方纲曾有“寄语二樵圆夙梦,苏门学士待君来”诗句(黄丹书《明经二樵黎君行状》),足见众望之隆。黎简有《批点李长吉集》,光绪年间扫叶山房曾将之与黄淳耀批点本合并石印,较为常见。但是黎简手批《昌黎先生集注》,传世无多,知道人也就很少了。有幸的是,笔者见到两种黎简批点《昌黎先生诗集注》的文字,一为手批本,一为过录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黎简批《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该书封面题签:“昌黎先生诗集注,黎二樵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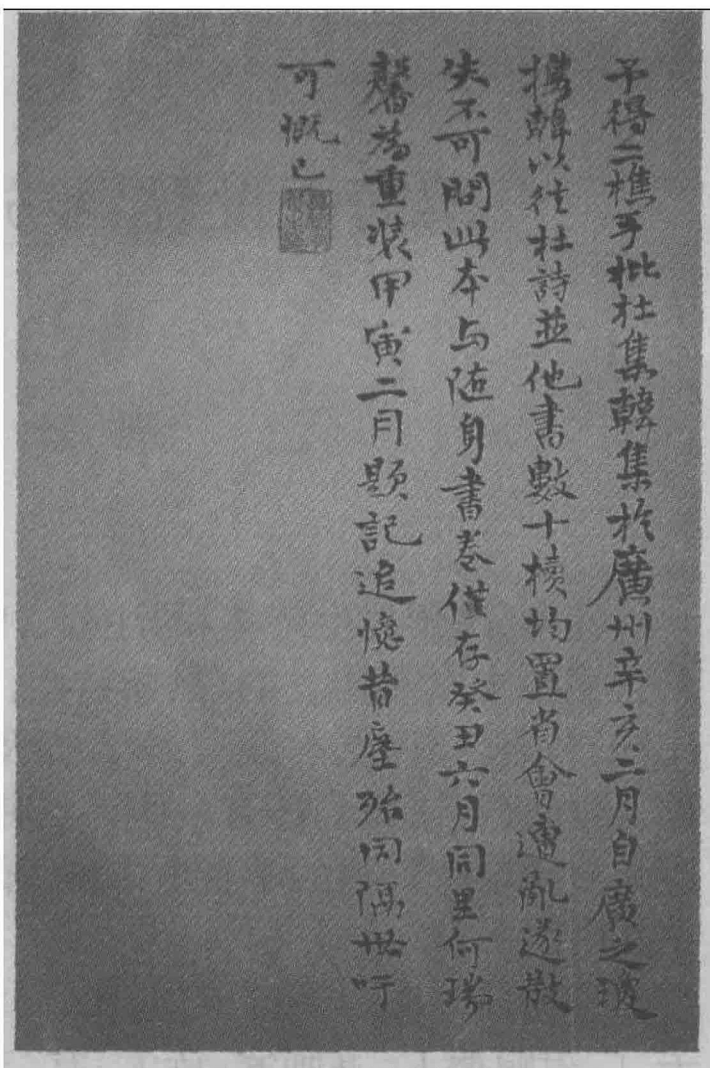
* 本文是教育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中国各体文学学史》[O2JAZJD750.11-44004]中《中国诗学史》之一部分。

生藏本。”原本为康熙三十八年顾氏秀野草堂刻本，黎批为墨笔手书于页眉。在卷首行下等处钤有“黎简印”、“此书曾在黎二樵之家”，“二樵所赏”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所藏书印”、“莫棠字楚生印”、“苍虬经眼”印、“大隆审定”、“国立同济大学藏书”、“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等印章。扉页有莫棠的一段题记，曰：

予得二樵手批《杜集》、《韩集》于广州。辛亥二月，自广之琼，携《韩》以往，《杜诗》并他书数十帙均置省会，遭乱遂散失不可问，此本与随身书卷仅存。癸丑六月，同里何瑞馨为重装。甲寅二月题记，追忆昔尘，殆同隔世，吁可慨已。（后有“莫棠字楚生”印）。

独山莫氏，为近代著名的藏书世家。莫棠，字楚生，为道、咸间著名藏书家莫友芝的侄子，曾任广东知府，藏书以精审著称，“独山莫氏铜井文所藏书印”即为莫棠藏书印。莫棠所藏此书，卷终有叶尔安的跋语。尔安，字贞甫，咸丰八年以训导留河南羌委，以知县用，有政声。其跋语曰：

此本为粤东黎二樵先生手评者，今归其同乡桂司马笙陔，携至大梁，出以示余，并为余道先生文学名，云此本特其一斑。余挥汗读数过，极叹鉴赏之精，及观至《月蚀》诗中“附记”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品

则，益知先生深得唐贤三昧，能各道其筋髓，而非独肆力于一家者。且惟其眼力既到，故能句斟字酌，不遗余力。如集中间有率倍之句，正名手不加修饰处，自来评选各本，非震其名而故奇之，抑或不敢自信而讳之，先生直指其疵，不以好之而强作解事，尤见卓识。嗟乎！大声不入于里耳也久矣。先生于尘羹土饭中出所心得，其有功于前贤后学，岂浅鲜哉。惜不得先生所著各大家全集读之，是亦一憾，置之案头，心玩不已，为跋数语以归笙陔司马。笙陔有嗜书癖，为搜藏家中卓卓者。今年避夷乱来此，遗弃几数百架，与余言辄唏嘘久之，吉光片羽，尚其宝诸。仁和叶尔安识于中州之监河署斋，时咸丰戊午（1858）立秋后二日。（后钤“南阳叶氏尔安印”、“贞甫一字子珊”印）

在叶氏题跋后，还有王欣夫先生的跋语：

此黎二樵手评昌黎诗集注，廿年前仲兄苍虬得之莫氏铜井文房。曾共展玩，爱不忍释。后与贾人易他书，深惜未及传录，恒用怅怅。展转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前年余奉调来此见之，悲喜交集。悲者仲兄已墓有宿草，睹物思人，益增鹄原之痛；喜者多年怀想，仍得快读，因亟借出，照临于景印世彩堂本上，四日而毕，并识卷末，藉留鸿爪云尔。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王欣夫书于江湾之筑庄。（后钤有“大隆审定”印）

从这三处题记可以看出此书展转流传的历程，这个本子之所以受到众多藏书家的珍爱，乃因为它是黎简手批本，钤有黎简本人的印章，且手泽可珍。

此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过录本。《中国善本古籍书目》上著录莫友芝批、王秉恩批校的《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为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级藏品，现已制成光盘。其实此书并非莫友芝、王秉恩批，而是黎简批的过录本。这部韩愈集，为卢雅雨商定、桐城方扶南通考、春及堂藏板的《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该书在每卷的末尾都有数张空白页，其中行草手录黎简的批语。批语文字与复旦大学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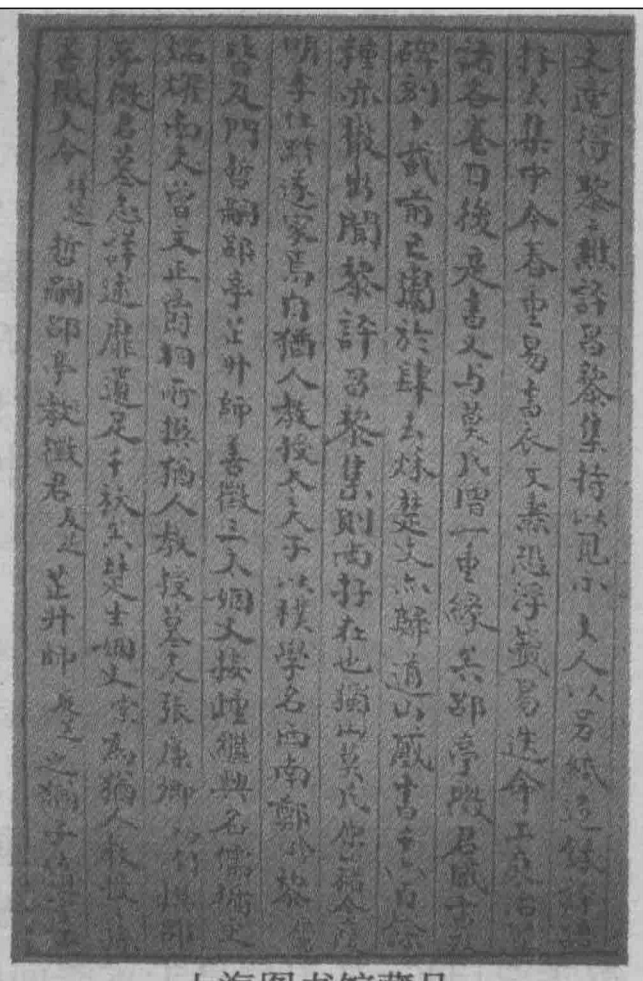
馆藏本相对照，完全一致。该书钤有“子偲”、“莫友芝”、“苾泉莫友芝读本”、“则心第五”、“华阳王秉恩读本”等印章。“子偲”就是莫友芝的字，说明此书曾为近代藏书大家莫友芝、王秉恩所收藏。该本题跋与复旦图书馆藏本相比，没有王欣夫跋语和印章，叶尔安跋语的末段又加上“中多不安之处，以其著此本评语所自，姑存之”数句，当为过录者所加，并且无“南阳叶氏尔安印”、“贞甫一字子珊”印。那么上海图书馆藏本的黎简批语与复旦图书馆藏黎简手批本是什么关系呢？

上图本卷首有王秉恩的一段题记。王秉恩，字息存，号雪岑，四川华阳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与独山莫氏为世交。其题记曰：

此独山莫邵亭先生点本。哲弟芷叔教授所赠者，诗与注均已加墨，前辈读书不苟如此。雪岑记。

王秉恩指出，他这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原是莫友芝（邵亭）点校的本子。后来由其弟莫庭芝（芷叔）赠给王秉恩。但是上图本上的黎简批语，并不是莫友芝逐录的。请看上图本卷末王秉恩之子王文焘的题跋：

此书原为独山莫氏藏籍。光绪初元，芷叔太姻丈夫子（文焘启蒙师）赠家大人者。……家大人游黔时撰修《本黔纪略》，芷师适掌教城南书院，亦预修官书役，故过从极密，赏奇析疑，时以图籍互假，读校赠答，此书其一也。大人志之册端，尝携自



上海图书馆藏品

随。丁未、戊申间，大人自钦廉道改组回羊城。楚生姻丈适得黎二樵评《昌黎集》持以见示，大人以另纸迻录评语存于集中，今春重易书衣，文焘恐浮签易迭，命工装治置诸各卷目后，是书又与莫氏增一重缘矣。……己巳二月清明华阳王文焘识。

从王文焘己巳(1929)年的这段题跋，我们似乎觉得黎简评点《昌黎集》与独山莫氏的有着宿命式的缘分。据此跋可知，上海图书馆藏本就是王秉恩从手批本迻录过来的。王文焘在《题记》里还曾提到莫氏藏书后来散失殆尽，“闻黎评昌黎集则尚存”。后来这原批本和过录本分别入藏复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在乱世中，黎简批点《昌黎集》能幸存于天壤间，实赖独山莫棠和华阳王秉恩之功。

关于黎简的批语，我们首先来看被叶尔安称为深得“唐贤三昧”的《月蚀》诗“附记”：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本是删繁就简，而曰效玉川者，谦语也。韩作不如原作，后人怖韩大名，不敢议耳。李唐以来，作诗而不出力求新，断难讨好。三家村学究动称渊明、王、孟、韦、柳，以恬淡为正宗，此亦何尝不是。然恬淡难到，涵养难醇，元非粗浅人所易籍口也。大抵近千年以后，作诗不自抵死生新，决难名家。但其中有一段极难的工夫，又非作者欲得便得也。难处在极出力造作时，顾得奇壮一边，便顾不得情韵一边。即就韩公诗上论，每于大力排荡中得一二最有情有韵之语，如“梅花灞水别，官烛骊山醒”之类，集中亦不易多见之，即令人神魂清适，吟咏竟日。此为最难也。下此，东野容有之，玉川竟绝无一言矣。嗟乎，以此法观古人诗，则真诗易见，而亦真诗难作矣。因读《月蚀》诗记于此。

昌黎《陆浑山火诗》、玉川《月蚀诗》，亦能使后人不敢动笔便模仿。笔敏而腹俭，与学富而气馁者皆不能。韩公好奇，至樊宗师《绛州园池记》、玉川《月蚀诗》，则奇过于则矣。故韩节其太奇之作，加以裁剪，自成一篇，曰效玉川云。友人陈槲芳

云：“《月蚀诗》，昌黎遂节省玉川之繁，然毕竟不如玉川也。玉川此作，初看似可厌，乃四五通细玩之，见其缠绵悱恻之意，是盖得屈子用情之变。”吾初不然其说，久之乃叹吾友之知言也。然而文章乐事元不在此。前人谓“玉川诗是巫覡语，长吉鬼语，玉溪儿女语”云云，读玉川《月蚀》诗，似读《江》、《海》等赋，要资其润色吾文章，了不可得。《月蚀》诗发端自《招魂》、《天问》而来，奇则奇，怪则怪矣，若谓遽得《招魂》、《天问》之真切、之趣妙，则亦无人许可之。古圣贤才士寓讽谏之文，多于比托，其好处在许人知其意，而不许人处处指定其比托之迹，屈《骚》尤其盛也。若此诗，读来光怪陆离，似是千门万户，莫可指定。然一再按之，则句句皆是比托之迹，此所以去古远也。玉川此作，经予此论，能不诗魂心死！

中唐卢仝的《月蚀诗》，险怪僻涩，运用古代佛、道、神化传说等各种典故，影射现实政治生活，在当时影响很大，韩愈作《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过去，关于卢、韩二作之优劣有不同的说法，如陈齐之说：“韩虽法度森严，便无卢仝豪放之气。”王观国《学林新录》说：“玉川子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约之以礼。”王元启则批评卢诗不宜径述时事，致失比兴之体，不如韩诗“笔削谨严，不愧卓然典则之文”。^②历史上既有伸卢抑韩者，又有伸韩抑卢者，而总体上后者更多。黎简对二者的轩轻，明确指出韩不如卢，并从理论高度给予说明。黎简提出，汉魏盛唐诗人的恬淡，后人难以达到，汉魏盛唐诗人的涵养，后人难得醇厚，因此“李唐以来，作诗而不出力求新，断难讨好”、“大抵近千年以后，作诗不自抵死生新，决难名家”。这说法，近似于蒋士铨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宋人和后代宗宋诗派，就是知其“难为”而为之，因此要求新求变，黎简诗风幽峭警拔，也是求新求变的结果。不过黎简又认识到，求新求变的偏颇是“顾得奇壮”，“便顾不得情韵”。的确，宋元以后的诗歌，追求格高调逸可以达到，追求情韵高致，就勉为其难

了。韩愈诗里还有“梅花灞水别，官烛骊山醒”之类情韵深致的句子。（黎简在《奉合兵部张侍郎酬郢州马尚书只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郢州之作》称赞这两句“亦集中不得落第二也”）；而卢仝就只剩下奇壮险怪了。虽然黎简认为《月蚀》诗韩不如卢，但对卢仝此诗也给予批评。他分析说，卢仝诗的缺点就是一味地奇壮险怪，“顾不得情韵一边”，“奇过于则”了，因此韩愈作此篇《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加以裁剪，自成一篇”。人们常认为卢仝的《月蚀》诗的奇险怪异风格是自屈原的《招魂》、《天问》而来。黎简分析说，《招魂》、《天问》的比兴寄托，寓讽深隐，而《月蚀》诗的比托痕迹太显露，可以按迹而索，不得《招魂》、《天问》真切的妙趣。黎简对自己的这段分析颇为自负，说：“玉川此作，经予此论，能不诗魂心死！”的确，黎简关于后代诗人不得不创新的努力，关于“奇壮”和“情韵”两个偏向的论述，关于卢仝《月蚀》诗比托显露的批评是深中肯綮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能如此细致地、富有思辨性、逻辑性地评点一首诗歌，在清代诗歌评点史上也是可贵的。

因为黎简批点《昌黎先生诗集注》，一般研究者很难见得到，笔者择其要者作简要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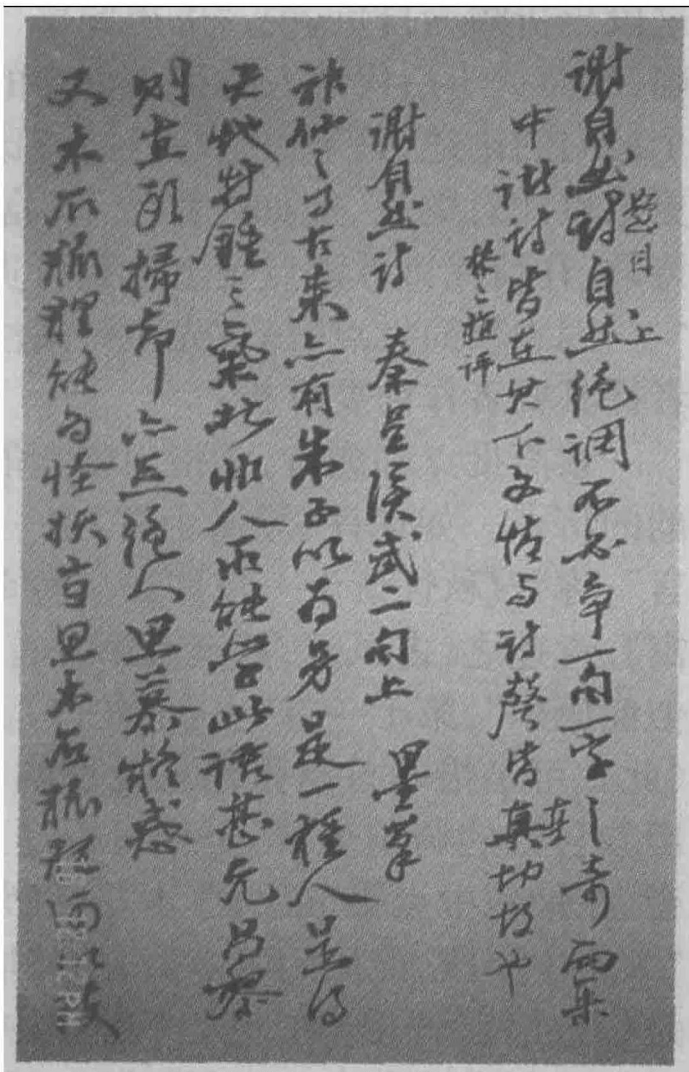
黎简批点韩愈诗，常指出韩愈能于奇壮之外，得汉魏盛唐之情韵的特点。如他评《琴操十首》之一《将归操》说：“音节之妙，不可言”；称赞《秋怀诗十一首》“去尽矜奇，渐归淡永，几可继射洪之《感寓》、青莲之《古风》”，甚至说第一首“去《十九首》不远”，第五首“绝似谢康乐”，第十一首“去《十九首》、阮公《咏怀》不远”。韩愈的长诗《此日可足惜一首赠张籍》，凡百四十句，追溯与张籍起初的结交，历叙自己的崎岖艰难，至今日重逢又即将分别，长篇铺叙，纵横杂沓。在铺叙中点缀“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二句写景，黎简批曰：“大篇中小段，能用闲笔点染，故特取此二句以告作大篇者。”这正是《月蚀诗》评语“每于大力排荡中得一二最有情有韵之语”的意思。又评《送湖南李正字归》诗曰：“绝似王、孟”；评《谴瘴鬼》曰：“清

波一笔，唐代诗家惟李杜二公以《骚》情人诗，故超绝千古者，后且让韩公独妙一时矣”；评《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曰：“公诗典厚，自似《选》体，非有意学之也。”这些批语，都是指明韩愈诗歌中有以情韵见长，风格典厚，与汉魏盛唐面目相似的一面。当然黎简也遗憾韩诗“奇肆处多，绵远处少”（《送惠师》评语）。韩愈与汉魏盛唐诗风相比，毕竟走得太远。

韩诗中更多的是自具面目的奇崛险壮的风格。对于韩愈的这种诗风，明清时期的宗唐诗派是给予贬斥的。但是宗宋诗风、求新求变的黎简，对韩愈奇崛险壮的诗风则多是欣赏的。《谢自然诗》是体现韩愈奇险诗风的著名作品。朱彝尊论诗崇尚醇雅、重视唐音，曾批评韩愈的《谢自然诗》“率尔漫写，不见作手”；程学恂也批评此诗“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可置不读”。黎简则极为称赏此诗。他说：

《谢自然诗》，自然绝调，不必争一句一字之奇，而集中诸诗皆在其下。文情与诗声皆真切故也。韩公自有此种诗，矜奇是其所好耳。

韩愈的《县斋有怀》追溯从“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到“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的危难历程，黎简评曰：“不必作惊怪状，而自然句奇语重，又极铺张约束，杜子美以后惟昌黎能为之。学昌黎者当知此



上海图书馆藏品

是昌黎真面目也。”《岳阳楼别窦司直》写洞庭湖的“惊波忽荡漾”的奇景，并感慨自己“窜逐归”的经历，黎简批曰：“此种诗，宏博如金钟大镛，发声则满天地，未暇择其佳处，又无佳处可择也。”这些都是韩愈长篇铺叙，宏壮奇肆的诗篇。黎简从宋诗学的角度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于韩愈诗歌的一些句法特点，黎简在批点时有意剔出。如批《孟生诗》说：“韩诗每于韵上一字用‘所’字，如此诗‘所’字凡三见，皆在第四字，此亦诗家因韵牵字之病。但韩公善于安放，为不觉耳。”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末句“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长达十三个字。黎简批曰：“十三字一句，当理会去得一字否，若节得去，不是长句笔力也。唐人能为长句，东山李白尚矣，外此惟有杜韩。”善用长句，在唐代前有李白，后有韩愈。

此外对韩愈诗歌，黎简也有一些直接的批评，如论《刘生诗》曰：“昌黎示儿诗，惟谈贵势。此诗曰‘往取将相酬恩仇’，教儿岂在贵势，将相岂为恩仇耶！我大不解古人立言之旨，何肯为之曲说。”像《感春二首》里“朱朱兼白白”、《读东方朔杂事》里“卫官助呀呀”等韩愈生造的句法，黎简对此给予严厉的批评。正如叶尔安《题记》里所说，对于韩愈率倍之句，“先生直指其疵，不以好之而强作解事，尤见卓识”，这正是黎简手批韩诗的一个特点。

注：

①参见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②参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61—762页。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